

红会应把公众情绪当改革动力

秦 丹

美微博炫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并不是关键因素。细究一下,许多人即便是对红会暂时失去信心,也并没有对慈善失去信心。红会在慈善方面的组织力量和专业支持,短时间内难以复制,因此,公众还是对红会抱有不小的慈善希望。记得去年11月间,22岁的中国留英学生姜晓彤,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万元,认为“尽管中国红十字会近期的公信力受到动摇,但作用不可取代”。

在红会的百年历史上,在最基本的应急救援、应急救援和人道救助方面,红会的一批批工作人员,做出了各种各样艰苦卓绝的努力,成绩难以否定。红会需要在改革中新生,而不是在否定中沉沦。因此,公众对红会的感情,真有点“恨其不爭”。好在,红会透过公众情绪这面镜子,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对一颗觉醒的心而言,洗心革面,正是公众的期盼。但不可否认,任何改革都可能要面对利益调整,红会的新生,阻力不可谓不大。

最近,有媒体曝出“深圳应急救援培训收费为省物价局定价10倍”的新闻,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回应称,由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援培训从未收过费,收费的是一家名为“深圳知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市红十字会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对此,又有人提出疑问:市红十字会官网公布的救护培训咨询电话,为什么是由知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类似这样一个个的问号,就会影响到红会的公信力,需要红会认真对待。

红会要把公众情绪当成改革的推动力。在郭美美事件后,各级红会有机构开始网上公开收支细节,红会总会也推出了捐款信息发布平台,为公众的监督提供了可能。一个组织的良好运行,没有配套的有力监督,是难以实现的。庞大的红会需要监督,需要法律、政府、社会以及红会的全面监督。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对红会的监督,更要在社会监督上做文章。尤其要深切认识公众监督对红会健康成长的意义,把监督从制度上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消弭公众因为一次次失望,而对红会积下的不信任。

新民随笔

简单的艺术

张晓然

巨型的舞台演出,如今是越来越多。计划来沪上演的赖声川《如梦之梦》,长达8小时,场面之大,需要再造剧场才能容纳。今年艺术节的首幕大戏《波希米亚人》,布景是一座顶天立地的写字楼,吓我一跳。京剧《赤壁》,也把写意的布景搁置一旁,上下几层,浩浩荡荡100多号人的大排场。

可也有些“极简主义”的节目与观众见面了。这些简单的艺术,无论是舞台置景,还是演员数量,都极简单。我虽然时常会被宏伟壮观的演出震撼,但更喜欢的却是简单的艺术。因为它们更适合互动,更容易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更容易制作成巡演版本,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去交流。

近日编发了两个稿件。一是爱丁堡前沿剧展在上海演出,其中英国戏剧《屋中怪兽》居然没有道具,四名演员凭借无实物表演,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社会主义工”故事。而西班牙的《安德鲁与多莉尼》,仅比前者多了几个面具而已,却以极富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将全家人对患有老年痴呆症母亲的爱呈现得跌宕起伏,令观众悲喜交加。从这个稿子,我还联想到周立波的贡献,一个人一张嘴,让几千人在剧场里时而动脑筋,时而捧腹笑。另一个稿子,是下月要来沪演出的京剧《赤壁》,大制作、大场面、大价钱,票全卖光,也不够付成本。如果今后戏都这样演的話,叫那些草根戏迷怎么敢跨进戏园子啊。

其实,我认为简单的艺术,并不是说这些艺术本身简单。精湛的艺术,去除不必要的包装,减少虚张声势的布景,放下点折腾人的身段——一些名演员为了突出自己,给自己乱加戏,简单的剧情变得复杂难懂,无非想多拿钱。这样的简单艺术,可能就是比较纯粹的艺术。京剧《三岔口》里,李少春和谷春章两个名角,就在一张桌子上摸黑“大打出手”,再简单不过了,而现在此戏已成为我国武打戏中具有代表性的剧目之一。陈道明、何冰主演的北京人艺话剧《喜剧的忧伤》,也是个简单的艺术,核心是陈道明出神入化的表演,和入木三分的剧情,有了最具艺术核心的东西,就够了。如今据说要买该剧的票,难度堪比春运火车票,被炒至数千元一张。它的成功,显然是不少大制作也难以企及的。

媒体视点

■ 人民日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发展红利》: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平衡,但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稳定的发展,就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建立这种平衡。(钟 声)

■ 京华时报《奖励网络批评更待理念转变》:接受批评监督的用意,将助推其施政理念策略的改变,而使其能够善待民众、善处矛盾问题、善对各方利益,因而能够及时消解民众情绪。(李光东)

■ 大众日报《“自酿米酒”暴露基层接待压力》:百顺镇这坛“廉政米酒”,体现了基层智慧,也显现了更多的基层无奈。其味绵长,其意深远,它再次告诉我们:对吃喝风进行休克治疗是多么迫切,建立上下左右同步、联动的机制是多么重要……(张培元)

观点圆桌

建“幸福城市”准备好了吗?

新闻焦点:据媒体报道,“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

应早定雾霾天室外活动标准

议,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职能部门早日制定出权威的标准和规范来,具体指导公众和公共机构采取统一行动。(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皇后”咱可娶不起

一男青年相亲,觉得姑娘什么都挺好的,可听说她的淘宝信用刷到了蓝色皇冠,忽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这个等级得立刻反应为,全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天呈 画

先补“幸福短板”

“幸福城市”什么样一时说不清楚,但“幸福短板”不弥补,城市肯定不幸福。“幸福短板”往往体现为民生工程的欠账上,如,收入分配、住房、看病、交通等。 于文军

解决“中国式问题”

善良的中国百姓对幸福的期望并不高,人多资源少,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就行。具体来说,让老百姓幸福,就要先解决好“中国式养老”、“中国式堵车”、“中国式上学”、“中国式医疗”等问题。 杨国栋

幸福是什么样子

相比GDP评价的客观性,幸福的统计有更多主观的成分。在实施中会否出现“为了政绩故,公众被幸福”的情况?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即便真要将幸福纳入施政目标,其考核与评判也不妨交给第三方机构。 吴 江

莫让“圆明园”成漫天要价代名词

方 翔

发轩然大波,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这次拍卖的抵制、抗议和愤怒,但最终三件艺术品拍出了天价。这无疑使许多人看到了“圆明园”的巨大品牌价值,于是在2009年的时候,鼠首与兔首在法国巴黎“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中现身时,主办方的高调宣传令这两件艺术品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面对海外拍卖行以及一些收藏者,纷纷祭出“圆明园”这张金字招牌。我们反对把“圆明园”作为拍卖行漫天要价的代名词,在愤怒之余,更应该警惕“爱国主义”被利用而成就了天价:有关的专家反对声音,成为了证明文物来源的最好证明;一些到海外淘金的投资者,则打着帮助国宝回流的旗号,既赚了名声,又为再次卖出做好了铺垫。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曾经表示,国家文物局对拍卖圆明园文物的行为持一贯态度,“我们是反对拍卖的。不承认对被劫掠文物的非法占有,并将继续依照相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追索历史上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圆明园所有流散文物理应归还中国,但由于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不适用于公约生效前被盗或者非法出境的文物。在1995年出台的《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规定文物追索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50年以内提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文物从被盗时起,所有国政府50年之内不提出追索,那么,50年之外的文物追索就不受公约保护了。那我们究竟如何面对“圆明园”文物拍卖呢?

在今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流失文物”等8类文物不得拍卖。而要在拍卖场上追溯这类文物也并不是难事,特别是像此次拍卖的两件“圆明园”文物,同类的拍品虽然在拍卖市场上并不少见,但是真正体现其身价的还是那张“出身证明”,只要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其流向,一旦出现在内地拍卖市场上就立刻禁止其拍卖,让其在内地失去流通的机会,其炒作的空间自然会被封杀。